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我见

周 芳 芸

“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同五四运动一样，在其开始，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①。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致力于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为“五四”文化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然而，多年来，不少的历史学家、文学史家在评说这段历史和文学运动时，却往往因人废文，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全盘否定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

(一)

有些同志认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都不过“是在文学形式上兜圈子”，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任何事物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艺术形式是同文艺作品的内容密不可分的，是它的内在形式。任何文学形式一旦被采用、被实践，就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为内容服务。世界上完全脱离内容的抽象形式是根本不存在的。纵观古今几千年历史，凡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文学改良运动，尽管都是从形式改革入手，但是没有哪一次

不触及内容的革新，没有哪一次不是直接或间接地为现实服务。唐代的古文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起八代之衰”，要变革六朝末期那种衰朽文风。但这种文风的“起衰”却是和古文运动的改革者们要从意识领域内“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②，力求挽救唐王朝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以促进唐王朝“中兴”的政治主张相一致的。中国如此，西欧也不例外。1827年，雨果的《〈克伦威尔〉宣言》是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理论纲领和讨伐古典主义的战斗檄文。它从戏剧角度猛烈抨击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抨击僵化了的“三一律”。看起来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变化，但实质上强烈地反映了1830年革命前夕新兴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围绕雨果的戏剧《欧那尼》上演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正是当时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在它上演五个月后，法国就爆发了“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复辟王朝。既然发生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初期的文学革命都有这样的特点，在无产阶级组织上日益强大、政治上十分活跃时期出现的文学革命中，就更不可能有纯形式变革的现象出现了。

中外注目的“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运动，体现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精神，书写了新文学史上崭新的一页。它有着许多发人深思的地方。它没有以1896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黄遵宪、谭嗣同发起的“新文体”、“诗界革命”为起点，而是以1917年《新青年》

时代为发端；它不以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杂诗》作为标志，而是把《文学改良刍议》作为宣言；它不是以黄遵宪为先导，而是以胡适为“首举义旗之急先锋”^①。这一切，都说明了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不仅与资本主义初期外国文学改良主张有区别，而且与黄遵宪等改良主义也有本质的不同。

无庸讳言，胡适的确主张文学革命的运动要先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在他的文学改良“八事”中^②，有五条侧重谈形式的改良，但不能因为他主张形式改良，便说他改良的全部内容仅限于形式，更不能说其性质就是纯形式主义的。大家知道，所谓文学改良的形式主义，就是完全承袭旧的内容，只在形式上加以变化，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但胡适却并非如此。他强调形式的改良，意在更好地表达二十世纪的一切新内容。他深切地体会到旧的语言形式对新的时代内容的严重束缚。他认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③，要摆脱这种束缚，就必须首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④。只有这样，才能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⑤汇于文中，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外，还必须看到，胡适对内容革新，也是十分重视的。早在1916年10月，他在《寄陈独秀》的书信中，就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事”，明确指出后三条（即“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我在”，“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种精神上的革命，难道仅仅是文学形式上的改良吗？更何况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八件事的次序大改变了”^⑥，作者特地把有关内容改革的三条提到首要地位，并明确强调“我提到‘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文学内容的问题”^⑦。这些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作者之所以要从形式进行改

良，正是为了保证内容革新的实现。

综上所述，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绝非在文学形式上兜圈子。它反映了时代的趋向，代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与为形式而形式的改良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正因如此，《文学改良刍议》才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旧文化的水分岭，才能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

（二）

也有同志认为，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提出的一些文学主张，虽然触及到了文学的内容，但却是“有意回避或者抽掉了文学的阶级性”，这种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如果我们尊重历史事实，就不难发现，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的实质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潮流影响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他大胆否定了封建阶级旧文化，对那种“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的没落庸俗的封建士大夫情感进行了批判；他主张文学作品要“言之有物”，要有“情感”“思想”（即见地、识力、理想），极力推崇《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等具有强烈反封建精神，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他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榜样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公开号召文学家作费舒特、玛志尼^⑧，鼓励作家要象他们一样“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为追求资产阶级政治理想而奋斗！

由此可见，胡适在理论上的政治倾向是鲜明的、毫不隐讳的。这种鲜明的政治倾向，不仅表现在文学改良的主张上，也充分反映在他的实践中。

胡适曾说《藏晖室札记》是他的“思想草稿”^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16年胡适就有“欲为祖国造新文学”的宏伟志向^⑩。他认为新文学要反映人民的疾苦、

愿望、理想，要以“新思想为里子”^⑩；还说新文学“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要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⑪。因此，他主张把“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的情形”，作为新文学的内容之一（1918年），并让他们“在文学上占一位置”^⑫。这是胡适文学实践的总方针。这一方针不但比陈独秀提的“国民文学”还要鲜明，也比李大钊“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1919年12月）的主张提得早^⑬，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不会忽视这一基本事实的。

胡适实践的总部署是“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察”^⑭。在这样的总部署下，作为《新青年》编委之一的胡适，热心地致力于西方资产阶级宪政科学和文化的介绍，其目的是希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⑮。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昏聩者仍笃守东方旧习。与世界倾势，动辄背道而驰”。所以，他大力介绍西方“时事画”，“或讽刺时政。或褒贬人物”^⑯。他翻译了都德的《最后一课》和契可夫的作品，歌颂了莫泊桑笔下二渔夫“卒以爱国死”，“而卒不以卖国而死”的以身殉国的高贵品质^⑰。胡适还是我国最早翻译和介绍易卜生戏剧的积极者之一，并亲自撰写了《易卜生主义》，否定封建制度的法律、宗教、道德。仅1916年9月至1917年9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就发表了翻译和撰写的文章二十三篇，白话诗词十九首，表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也是他向西方“取法”的具体实践。

胡适的创作实践，也是他“思想草稿”中的一部分，同样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张。在他的新诗试验地里，不仅可以看到白话诗词的萌芽，文学形式改良的成果，也可以触及到他针砭时政、抒发情怀、追求理想的脉搏，窥见他所主张的文学作品的“情感”和

“思想”。当《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被反动政府封禁时，胡适作《乐观》、《一颗遭劫的心》表示抗议。他在《四烈士冢上没字碑歌》、《双十节鬼歌》等诗作中，歌颂了辛亥革命的英雄气概。所有这些，都是抒写“今日社会之情状”的具体实践，表达了作者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世纪初的胡适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客观上与当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潮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胡适在无形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了这一点。他在《沁园春·新俄万岁》中，表现了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二月革命胜利的喜悦，他热情地歌颂“囚拘流徒，摧辱惨杀而无悔”的“爱自由谋革命”的战士，欢呼“‘新俄’之未来”，“正未可量也”。

当时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是在李大钊亲自领导下创刊的。作为编委之一的胡适，对商定的方针是努力执行的。翻开他轮值编辑的《新青年》六卷四号（1919年4月5日），一股浓郁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在这一期刊上，刊有胡适翻译的《希望》一诗：“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该把这糊涂世界一齐都打破；要再磨再炼再调和，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集中地体现了他与旧制度势不两立、决一死战的反封建精神。同期刊登的鲁迅反封建制度的檄文《孔乙己》，“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⑱。此外，编者还特意刊登了译文《俄国革命的哲学基础》（上）（注：其（下）续登在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文中认为“俄国可立时行用共产制度”；为建设一个新社会，主张“不在部分的改良”，要实行社会的“急剧变革”，“至必要时，激烈的手段，也可以采用”。这里已经提到要用无产阶级的暴力手段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从这些文章中，不仅表明了编者当时的政治态度和文学观点，也反映了编者那时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影响下的进步思想倾向。

总之，不管是从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还是从编辑刊物的倾向上，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胡适没有回避阶级性。其实，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胡适，在那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也根本没有回避阶级性的必要。

(三)

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影响下，胡适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结成的“五四”文学革命统一战线中，有理论，有实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力所能及的积极作用。《文学改良刍议》曾被誉为文学革命的里程碑之一，它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等文章，共同奠定了文学革命联合行动的思想基础。但是，我们充分肯定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就无视它的局限性。

毛泽东同志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②。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虽然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提出来的，但毕竟没有能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囿束。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必然要反映在文艺观上，这正是胡适的阶级局限。

首先，胡适自始至终高举的是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旗帜，因此，他不可能自觉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而且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在世界观和文艺观上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如果说这些矛盾在“五四”统一战线初期还属于次要矛盾的话，后期便上升为主要矛盾了，因而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裂。这虽然是后话，但它证明了统一战线内部从最初一刻起就潜存着矛盾和危机。

其次，《文学改良刍议》虽然触及到了文学内容的革新，但这仅仅是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革新。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种革新主张一开始也就蕴藏了失败和

妥协的必然性。

第三，《文学改良刍议》既有割断历史的倾向，又有民族虚无主义的偏见。它对封建时代的文化否定过多，没有给中国几千年灿烂的历史文化以一定的科学地位。这种“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③的错误倾向，虽然在当时整个统一战线内部都存在，但胡适身上尤为突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现象，如果离开了它和周围条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毫无意义的东西。因为“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想象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④。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由首举义旗，到妥协投降、堕落叛变，最后沦为反动文人、卖国洋奴，正是在革命进程中各阶级关系演变的必然结果。他的文艺思想变化，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6—1917年，胡适的文艺观基本上是进步的。他的文学改良主张，从理论到实践，主流是积极的。

第二阶段：1918—1919年“五四”前夕，胡适的文艺思想产生较大的矛盾，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妥协性、动摇性已逐渐暴露，但矛盾的主导方面仍是积极进步的。

第三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从文学改良主张上的后退到政治上的倒退，反革命的一面日益暴露。正如瞿秋白同志所说：“‘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⑤。

鲁迅曾说，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顾及全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⑥。胡适的历史，是他自己写的，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评价胡适在文学史上的功过，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影响，应实事求是地

(下转58页)

复活；但是最后当他的女婿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他又成了一个浑噩的白痴。这悲惨的事实无异于告诉读者：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是毁灭人性的，革命的暴力手段同样是毁灭人性的；只有一切阶级的人彼此相爱、和睦相处，才能使人的理性放射光芒。

梅尼特医生的女儿与侯爵的子侄相爱，建立起了幸福的生活，却由于医生对侯爵的一纸控诉书而破坏了。这个奇怪的事实也无异于告诉读者：当两个敌对阶级的人们不念旧恶、和谐相处时，一切都会是美好的；而当他们硬要清算往日的冤仇时，美好的生活就不复存在了。

对《双城记》的主题思想，历来有不同的见解。一些西方资产阶级评论家，认为小说的主题在于表现一种无私的、伟大的、永恒的爱情，正是这种爱情，战胜了暴力，战胜了死亡，使卡尔登这个人物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有意无意地缩小和冲淡了这部作品关于革命的、政治的

主题。

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似可从下面两个方面来概括：一方面，揭露了贵族统治阶级的暴虐统治和残酷剥削，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和暴烈抗争，揭示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

另一方面，通过对十八世纪法国历史的再现，总结历史的教训：提醒统治阶级不要压迫太甚，不要把人民逼上梁山；劝喻人民群众不要采取暴烈行动，以免造成玉石俱焚的严重后果。思想上的人道主义，导致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就是狄更斯反映社会生活、寻求社会出路的出发点和归宿。狄更斯和十九世纪的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当他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去揭露和批判反动统治阶级罪恶时，是极为出色的，甚至是伟大的。当他遵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提出改革社会的方案时，却显出糊涂甚至荒谬了。

（上接52页）

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他后来堕落而否定他前期的积极作用。事实证明，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主流是

注释：

①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③ 韩愈：《进学解》

④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⑤ 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⑥ ⑦ 胡适：《谈新诗》

⑧ 胡适：《逼上梁山》

⑨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导言》

⑩ 费舒特(1796—1879)：又译费希特，德国哲学家。曾创办《哲学和思辨神学杂志》，企图创造伦理学的有神论体系，以“个性”为主要概念。玛志尼

积极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否定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应有的地位，实质上也就否定了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否定了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就。

(1905—1892)：意大利爱国志士、政治思想家，革命共和派民主阵营领袖，一生致力于摆脱国外的专制和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

⑪ 胡适：《藏晖室札记·自序》

⑫ 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二

⑬ ⑭ ⑮ ⑯ 胡适：《藏晖室札记》卷十三。

⑰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⑱ 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

⑲ 胡适：《〈二渔夫〉·序》

⑳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㉑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㉒ 《列宁选集》第三卷

㉓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㉔ 鲁迅：《〈题未定〉草(六)》